

西周王朝经略鲁北地区的考古学观察

李首龙¹ 井中伟²

(1.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长春, 130012;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杭州, 310000)

鲁北地区^[1]是中原王朝长期经营的重要区域, 晚商文化曾对该地区保持强烈的扩张态势。西周时期, 伴随着周人东征与分封, 周文化的介入更是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面貌。目前, 鲁北地区西周遗存的年代与性质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在此基础上, 学界对该地区周文化的演变与周王朝的经略方式等方面也十分关注^[2]。但此类研究多侧重于文献史料的解读, 对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分布态势与演进的探讨却较为薄弱, 对该地区多种复杂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研究。鉴此, 本文在以往分期的基础上^[3], 以考古学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相关史料, 尝试对该地区西周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与政治势力的变迁作出有益探讨。

一、鲁北地区西周时期文化格局的变迁

(一) 第一期: 动荡与重组

西周早期鲁北地区存在两类文化遗存。一类是以中原文化成分为主的遗存。具体分布在潍河以西, 以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融合型文化因素为主, 土著类因素居从属地位。其中周文化因素虽然在数量上未居主导地位, 但高等级遗存显示出, 周人业已成为这一区域的统治阶层。结合原商文化中心聚落的衰落, 可知以商文化因素为代表的人群已经成为周人政治势力的附庸。不过, 从此类遗存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来看, 文化面貌上尚处于动荡与重组阶段。另一类文化遗存为珍珠门文化^[4], 以土著类因素为主, 分布范围被分割和压缩在胶东半岛局部地区及沿海岛屿上, 代表土著夷人的势力。

西周早期, 商文化曾经分布的潍河以西在文化构成上已异常复杂。虽然商文化因素无论在数量还是类型上仍占重要地位(图一, 13~31), 但周文化(图一, 1~12)、融合型以及土著类等文化因素的出现与发展, 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其中, 融合型文化因素复杂多样, 主要包括鬲、盆、瓮、尊等器类, 约17种, 与其他类文化因素相比, 类型最多(图一, 44~69)。但从组合成分观察, 商、周、土著等文化因素的融合体现出随机性, 似乎没有某种因素起到支配作用。土著文化因素较晚商阶段有

进一步发展,其数量与种类逐步增多,尤其以宽沿高圈足簋为代表的本地器形较为流行(图一,32~37、42、43)。在居址的遗存构成上,文化面貌也十分复杂,虽然目前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支撑定量分析,但已公布的材料显示,居址往往由两种以上的文化因素组成,并且不同地点的文化面貌也并非完全一致。比如临淄齐故城^[5]包含周、商、融合型文化因素的比重几乎一致,昌乐后于刘^[6]包含的融合型与土著文化因素甚至超过商文化因素,而长清仙人台^[7]的商文化因素却占主导地位。从大的区域分布来看,淄河以西地区的商文化色彩仍较浓郁,而以东地区融合型与土著文化因素明显,个别遗址甚至出现以上两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从墓葬材料来看,器物组合主要以鬲、罐为核心,与周文化基本一致,但器形则主要以商文化因素为主,并有少量墓葬共出有本地或融合型文化因素的器形,而周文化器物少见,如临淄后李的M35、M92、M93^[8]、北沈马的M8^[9]等。在铜器组合方面,常见以鼎、簋为核心,觚、爵、觶等酒器少见,反映出周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

从聚落角度观察,晚商以来的青州苏埠屯^[10]、桓台史家^[11]、济南大辛庄^[12]、博兴寨卞^[13]等大型遗址消失不见,刘家庄墓地^[14]也呈现衰退趋势。渤海南岸的盐业生产聚落在本期偏晚阶段迅速减少,黄河三角洲附近已基本不见该类遗存,莱州湾南岸的盐业规模也趋于衰减^[15]。同时,上一阶段大部分中小型居址也逐步凋零,整个区域的居址之间没有明显聚合,分布比较松散。此时,新崛起的高级聚落主要包括高青陈庄^[16]、阳谷梁山^[17]、寿光吕宋台^[18]、济阳刘台子^[19]等(图二)。其中,高青陈庄是此时潍河以西唯一设有城垣的遗址,城内发现的M17可能与齐太公后人相关。阳谷梁山的铜器窖藏出有铜器7件,包括太保方鼎、太保簋、太史友甗、伯宪鼎、伯宪盃等,应是周人的一处高等级聚落。寿光吕宋台遗址面积达80万平方米,地面采集到西周时期的铜觚、爵、戈,陶簋、鬲、罐、豆、盆等。其西南700米处还发现了西周时期大型制骨作坊,可能与纪国都城有关^[20]。济阳刘台子应是逢国所在^[21],发现的M2、M3为逢国贵族夫妇墓,其中M2出土的“季作宝彝”鼎可能暗示墓主来自周王室的嫁女^[22]。结合以上分析,周文化主要分布在古济水一线与淄河流域,这与晚商文化重点经营的区域大致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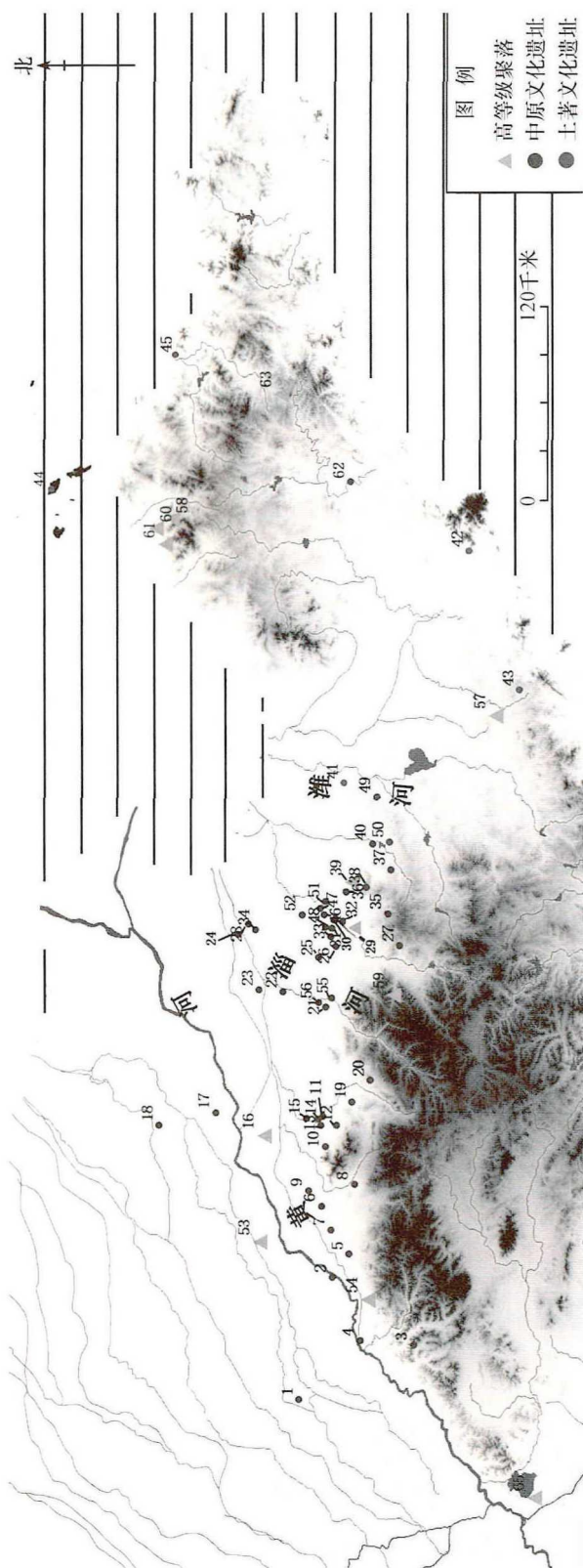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由于周文化势力的介入,商文化中心聚落纷纷衰落,代表周人势力的高等级据点沿晚商文化重点经营的地区进行布控。但此时周文化势头并未明显体现,潍河以西的文化构成十分复杂,主导性力量尚未出现,土著文化势力借此契机赢得了短暂发展。商、周、土著文化之间相互碰撞融合,催生出大量创新型器物,并且居址内部与居址之间的文化内涵缺乏稳定性。墓葬虽具有商文化传统,但随葬的青铜器与陶器组合则表现出周文化特征,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陶器也呈增多趋势。这些现象共同反映出鲁北地区的文化格局进入动荡与重组,尚未形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

西周早期,珍珠门文化仍分布在胶东半岛与胶莱平原,该文化最西端的会泉庄遗址则延续下来。青岛古城顶^[23]、王家庄^[24]等遗址也发现有较为单纯的土著文化遗

周文化因素	居址	1 2 3 4 5 6 7 8 9
	墓葬	10 11 12
商文化因素	居址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墓葬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土著文化因素	居址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墓葬	42 43
融合型文化因素	居址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墓葬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图一 鲁北地区第一期各组文化因素对比图

- 1~6. 鬲 (董东村F2:2、齐故城T201⑧:1、冯宋台:14、王府H95:1、唐冶H34:2、王推官庄H148:6)
7. 罐 (滨州:31) 8. 瓮 (王推官庄H148:7) 9. 簋 (钓鱼台:3) 10. 鬲 (齐故城M101:XM02)
11. 罐 (后李M35:1) 12. 簋 (刘家庄M74:1) 13、14. 鬲 (北沈马H14:1、兰家:5) 15. 簋 (仙人台H100:3) 16. 豆 (兰家:31) 17、18. (后于刘H32:2、仙人台Y1:3) 19. 盂形器 (双王城BZY1:1)
20. 瓮 (南河崖F4:11) 21. 筒形器 (南陈庄T1③:5) 22. 尊 (宁家埠H41:1) 23. 罐 (北沈马F4:1)
- 24~26. 鬲 (齐故城M103:66、马安M130:1、宁家埠M2:1) 27. 簋 (刘家庄M29:1) 28. 豆 (刘家庄M34:1) 29、30. 罐 (后李M35:3、北沈马M8:2) 31. 盆 (西菴M1) 32. 鼎 (唐冶H34:5)
- 33、34. 簋 (河西:6、后于刘F1:6) 35. 瓮 (后于刘F1:2) 36. 钵 (北沈马F4:2) 37. 盆 (宁家埠H16:1) 38. 豆 (会泉庄H6:1) 39. 鼎足 (会泉庄H6:5) 40. 盆 (会泉庄H6:2) 41. 杯 (会泉庄H6:12)
- 42、43. 簋 (马安M99:2、后李M35:4) 44~58. 鬲 (仙人台Y1:2、南河崖F1:2、珍珠门H8:36、后于刘H52:1、后于刘H14:1、后于刘H32:1、邹家庄F4:1、鲍家:22、邹家庄AT201②A:3、齐故城H59:2、凤凰台H614:6、王推官庄F1:1、后于刘H52:2、北沈马H5:2、北沈马G1:1) 59. 瓮 (唐冶H138:3) 60. 尊 (后于刘H92:2) 61. 罐 (王推官庄H131:13) 62~66. 鬲 (西菴M1:9、后李M93:3、北沈马M8:1、马安M122:1、西菴M1:1) 67. 罐 (东古M1002:2) 68. 簋 (刘家庄M89:1) 69. 鼎 (齐故城M103:6)



图二 鲁北地区第一期的遗址分布态势

1. 在平南陈庄 2. 平阴朱家桥 3. 李清仙人台 4. 济南王府 5. 济南唐冶 6. 王推官庄 7. 章丘董村 8. 章丘马安 9. 邹平鲍家 10. 邹平郎君 11. 邹平明礼
12. 邹平史营 13. 邹平五黑 14. 邹平廉家 15. 邹平凤凰台 16. 高青陈庄 17. 滨州兰家 18. 滨州后尹 19. 淄博皇姑顶 20. 淄川北沈马 21. 临淄齐故城 22. 广饶五村
23. 广饶草桥 24. 广饶南河崖 25. 青州凤凰台 26. 青州赵铺 27. 临朐陈冢河 28. 寿光双王城 29. 寿光吕宋台 30. 寿光火山埠 31. 寿光达字留 32. 寿光前曹庄
33. 寿光贾家庄 34. 寿光大荒北央 35. 昌乐邹家庄 36. 昌乐河西 37. 昌乐西 38. 昌乐宁家 39. 昌乐东圈 40. 潍坊姚官庄 41. 潍坊会泉庄 42. 青岛古城顶
43. 青岛王家庄 44. 长岛珍珠门 45. 长岛芝水 46. 潍坊延庆寺 47. 潍坊赵家仕庄 48. 潍坊西玉 49. 潍坊北流 50. 潍坊董家庄 51. 寿光董家庄前 52. 潍坊后王
53. 济阳刘台子 54. 济南刘家庄 55. 临淄后李 56. 临淄东古 57. 胶县西卷 58. 龙口归城 59. 青州弥河淤洼 60. 龙口徐家村 61. 龙口韩桑村 62. 莱阳前河前
63. 海阳发城镇 64. 阳谷县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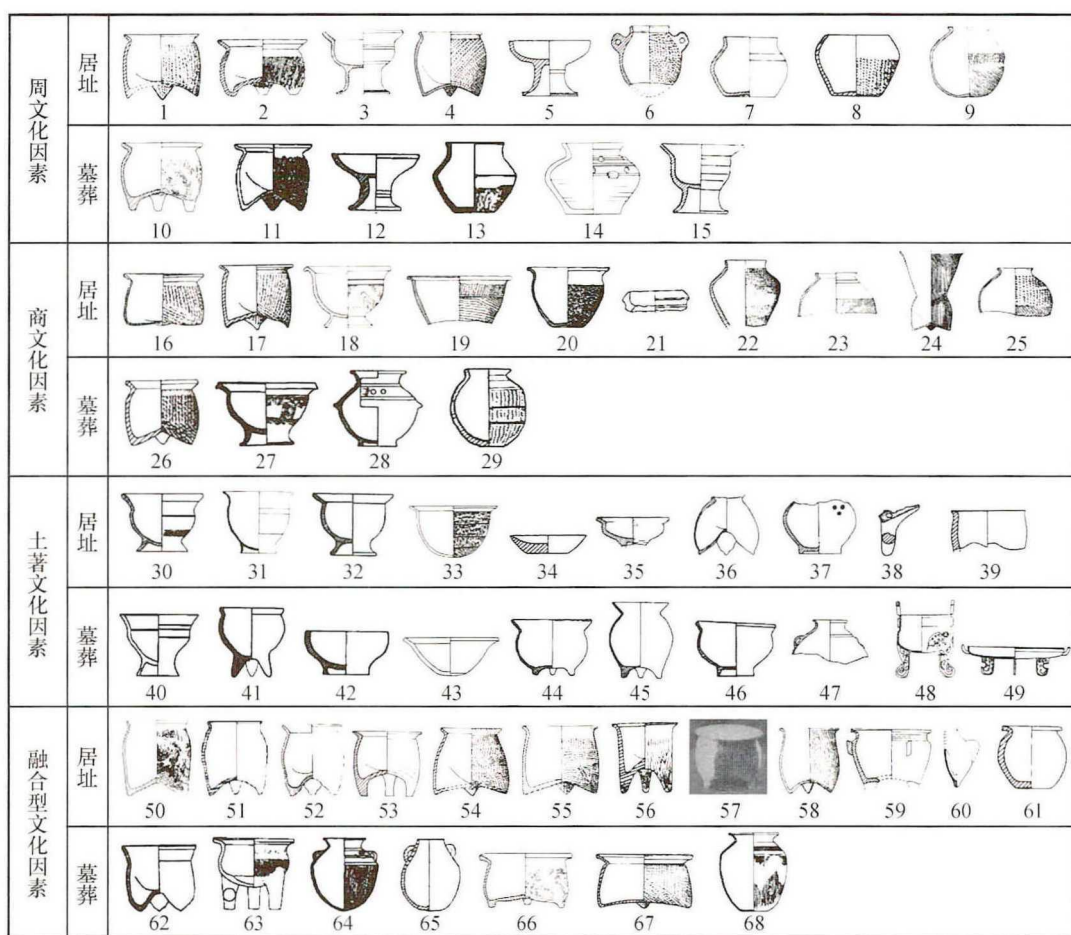
存,这表明珍珠门文化可能影响至胶东半岛最南端。从文化构成的角度观察,土著文化因素在该地区仍居于主体地位(图一,38~41),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十分少见。但此时珍珠门文化的典型器物素面大口深腹鬲已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束颈且腹较浅的素面陶鬲,此类陶鬲应是土著文化与周文化融合的产物,并且在淄、潍河流域继续流行(图一,46~49、56、62、63)。此时,周文化因素进入胶东半岛,如归城小刘庄^[25]、海阳发城镇^[26]、龙口韩栾村^[27]、徐家村^[28]、莱阴村^[29]等遗址均有青铜器出土,其中旅鼎、莱伯鼎、蔡姑簋、启尊、启卣等器物反映了与周人的密切联系。龙口归城M1^[30]、胶县西菴M1与其车马坑^[31]等,均有重食器的组合风格,并出土铜盞铃等周文化特色的器物。居址方面,新近报道的龙口归城以H20为代表的单位出土了折沿弧腹矮圈足的商式簋、折肩瓮、袋状绳纹鬲足、敛口豆等中原式器物^[32]。

从聚落角度观察,周文化据点多出现在胶东半岛北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龙口归城已初步建立^[33],对珍珠门、芝水^[34]等重要遗址形成包围之势。珍珠门文化势力虽影响至青岛地区,但周文化同样在海阳发城镇^[35]、胶县西菴^[36]等遗址与珍珠门文化对峙。这些现象表明,此时周文化以据点形式开始进入该地区,并在空间上形成对珍珠门文化的合围与挤压之势。中原文化对珍珠门文化虽有影响但十分有限,两者呈现出二元对立的局面。

(二) 第二期:改造与确立

西周中期,周文化统治地位的初步确立与土著文化势力的衰减是这一时期鲁北地区文化格局的重要特征。此时,潍河以西复杂的文化结构开始逐步稳定。周文化的器类与器形虽较上一阶段有微弱增长,但器物数量已大幅提高(图三,1~15)。融合型文化因素不仅在器物类型的数量方面有所下降,而且周文化在此类文化因素的形成机制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图三,50~68)。以居址材料统计的13种融合型器物为例,周文化参与的器形占10种,并且集中出现在以陶鬲为代表的炊器中,这反映出周文化对其他文化改造的深度。此时商文化因素虽仍居于重要地位,但器类、器形与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图三,16~29)。土著文化因素也较上一时期有所衰落,器类数量呈现退减,仅在陶簋方面影响明显(图三,30~35、40、43、48、49)。从居址遗存面貌来看,周文化与周文化参与的融合型文化因素成为大多数居址中的主体成分,居址之间的文化面貌也逐步趋同,这表明居址中以周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结构已经基本稳定。墓葬陶器组合中的周文化因素已有明确体现,常见细柄且中部施一周突棱的陶豆,以及素面圆肩罐等周式陶器。大致在本期偏晚阶段,随葬品中的分档鬲与素面大袋足鬲也几乎消失不见。综上,通过周文化对商与土著文化因素的改造,以及周、商和土著等文化因素的消长,周文化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初步确立起来。

从聚落角度观察,晚商以来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遗址已彻底衰落,这表明潍河以



图三 鲁北地区第二期各组文化因素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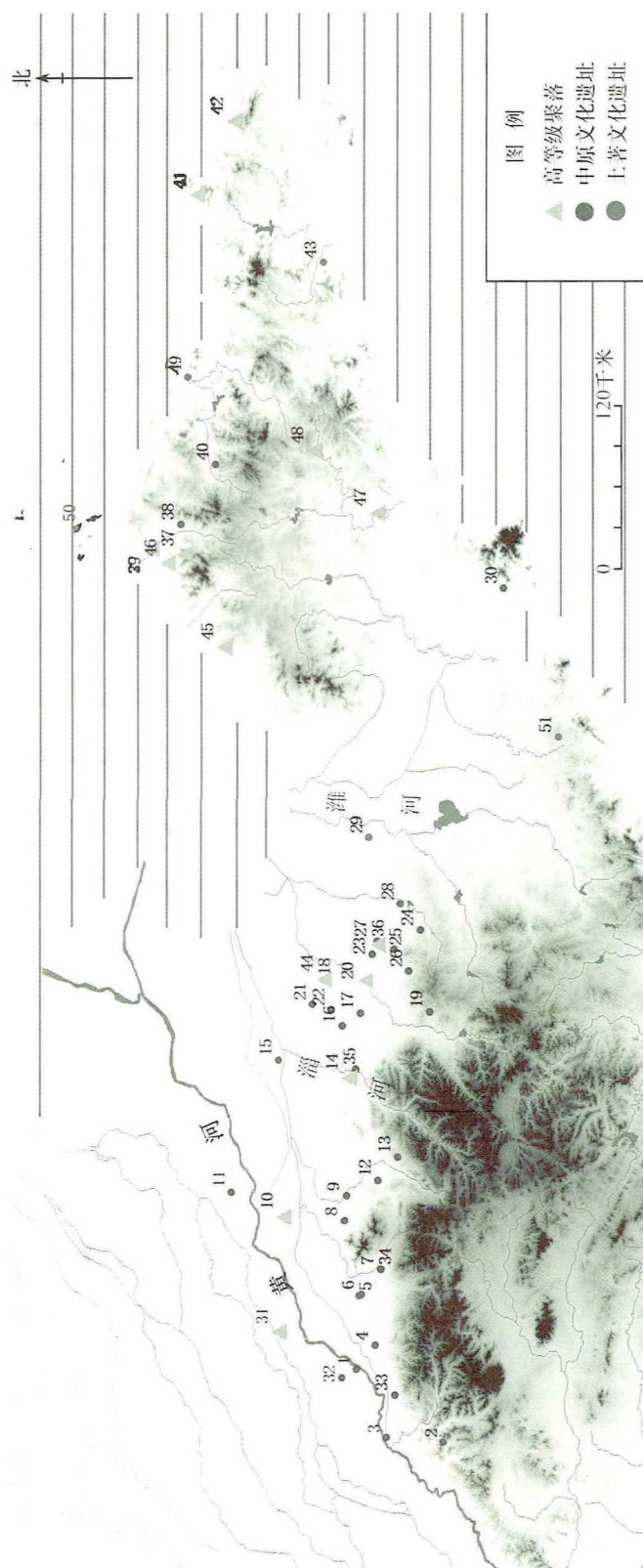
- 1、2. 鬲(宁家埠H182:6、河西:2) 3. 簋(昌乐:11) 4. 鬲(王府H78:6) 5. 豆(王府H103:1)
 6、7. 罐(王府H203:4、兰家:39) 8. 钵(宁家埠H5:2) 9. 瓮(王府H103:6) 10、11. 鬲(高青陈庄M26:8、马安M88:3) 12. 豆(大北庄) 13、14. 罐(后李M92:3、齐故城M102:70) 15. 簋(周家M2:3)
 16、17. 鬲(郝庄:15、宁家埠F8:1) 18. 簋(后尹:23) 19、20. 盆(王府H203:10、明礼:21) 21. 豆(马安H35:2) 22. 罐(宁家埠H182:9) 23. 瓮(后于刘H106:3) 24. 甗(北沈马H4:1) 25. 罐(王府H78:15) 26. 鬲(后于刘M9:1) 27. 簋(后李M92:1) 28. 甗(大北庄采集)
 29. 罐(周家村M2) 30~32. 簋(河西:26、赵铺:26、昌乐:1) 33. 盆(齐故城T125⑨:41) 34. 钵(济南王府Y1:1) 35. 簋(济南王府H152:10) 36. 甗(会泉庄H12:20) 37. 罐(会泉庄H10:1) 38. 鼎足(会泉庄H12:3) 39. 杯(会泉庄H12:14) 40. 簋(马安M88:1) 41. 鼎(大北庄) 42. 孟(大北庄)
 43. 盆(大辛庄M17:4) 44. 鼎(南黄庄M5:2) 45. 鬲(南黄庄M5:5) 46. 簋(南黄庄M1:1)
 47. 瓮(周家M2:148) 48. 鼎(刘台子M6:22) 49. 盘(刘台子M6:14) 50~59. 鬲(高青陈庄H201:1、长岛王沟采集、冯宋台:12、王推官庄H133:2、宁家埠H5:1、济南王府H90:3、潍坊坊:2、朱家桥采集、王府H181:7、王府103:3) 60. 甗足(南黄庄H10:1) 61. 罐(王府H203:4) 62. 鬲(后李M92:2)
 63. 鼎(马安M88:2) 64. 甗(大北庄) 65. 罐(周家M2:53) 66、67. 鬲(高青陈庄M18:6、刘台子M6:32) 68. 罐(南黄庄M5:3)

西的生业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图四）。内陆地区的高青陈庄、济阳刘台子、寿光吕宋台等高等级聚落依然使用，其中高青陈庄发现的两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尤为重要，M35随葬引簋铭文显示其与周王室有密切关系。济阳刘台子M6是该遗址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座土坑竖穴墓，随葬20余件青铜器，多见“夆”字铭文，该墓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37]，这表明该区域仍是逢国的势力范围。此时，临淄城已建立^[38]，现有材料虽表明其规模可能有限，但作为齐国都城的重要地位已不言而喻。此时聚落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盐业遗址的消亡与临淄齐都城的崛起则是该阶段的鲜明特征。

西周中期，原分布在胶莱平原与胶东半岛的土著文化势力迅速衰落。大致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会泉庄、珍珠门、芝水等遗址纷纷消失，反映土著文化特色的素面鬲在潍河以西已难觅踪迹。古城顶遗址的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大量施绳纹的夹砂灰陶片和中原式陶豆，土著文化因素几乎消失。较为单纯的土著文化因素主要出现在乳山南黄庄与寨山这两处遗址^[39]，学界多称其为“南黄庄文化”^[40]。南黄庄文化的陶器仍延续了素面、夹砂红褐陶、陶质粗糙等特点（图三，44~46），鼎式鬲、圈足碗、甗等陶器也与此前的珍珠门文化有继承关系。但南黄庄文化多受周文化影响，墓葬的陶器组合常见鬲、罐。陶罐为鼓肩、平底，且多施加附加堆纹、网纹、宽带波纹等纹饰。陶鼎、鬲与甗多见柱状实足跟和近平裆等特点，大都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改造。此时，周文化势力已遍及胶东半岛，但仍以半岛北部为主，重点经营龙口归城。不过该地区墓葬多朝向东，流行设置头箱，陶器组合以鬲、鼎、簋、豆、罐为核心，器物形制中的土著因素十分浓郁，腰坑殉狗习俗基本不见。这些特征与同时期典型周文化或潍河以西的文化面貌有明显差异，故有学者将其作为独立的莱文化区来看待^[41]。但具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在该地区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该区域的统治阶层仍为周人或其盟友势力，土著文化的分布范围受到进一步压缩，仅保留在极个别地点，几成“孤岛”。

（三）第三期：变异与扩张

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鲁北地区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封国文化业已形成。从潍河以西的文化构成上看，商文化与土著文化因素此时大幅衰减。商文化因素仅在简腹分裆鬲、鼓腹分裆鬲、弧腹盆等器形方面有所体现（图五，15~24）。土著文化因素则主要体现在宽沿鼓肩簋、卷沿深弧腹簋、宽沿斜腹簋等器形，且数量十分稀少（图五，25~33、36~38、40）。周文化及融合型文化因素在数量上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周文化参与的融合型文化因素在器形上逐步稳定，且数量进一步增多（图五，1~14、45~60）。总体来看，此时该区域的文化遗存与典型周文化具有高度相似性，如常见器物都有鬲、豆、罐、簋、盆、瓮等器类，墓葬中也都开始流行陶盂，且大部分器形可在中原地区找到相似器物。以上这些现象表明具有广泛意义上的周文化在潍河以西地区的



图四 鲁北地区第二期遗址的分布态势

1. 平阴朱家桥 2. 长清仙人台 3. 济南王府 4. 济南唐冶 5. 章丘宁家埠 6. 济南王推官庄 7. 章丘马安 8. 邹平抬头 9. 邹平明礼 10. 高青陈庄 11. 滨州兰家
12. 淄博皇姑顶 13. 淄川北沈马 14. 临淄齐故城 15. 广饶草桥 16. 青州凤凰台 17. 青州赵铺 18. 潍坊后王 19. 临朐陈家河 20. 寿光凤宋台 21. 寿光南台头
22. 寿光丰城西村 23. 昌乐后于刘 24. 昌乐河西 25. 昌乐宁家 26. 昌乐常家庄 27. 昌乐东圈 28. 潍坊姚官庄 29. 潍坊会泉庄 30. 青岛古城顶 31. 济阳刘台子
32. 济南大辛庄 33. 济南刘家庄 34. 章丘马安 35. 临淄后李 36. 潍坊胡家埠 37. 龙口旧城 38. 东河周家村 39. 黄县庄头 40. 栖霞大北庄 41. 威海
42. 荣城学福村 43. 乳山南黄庄 44. 潍坊后王 45. 招远东曲城 46. 龙口徐家村 47. 莱阳前河前 48. 海阳发城镇 49. 广岛芝水 50. 广岛珍珠门 51. 青岛王家庄



图五 鲁北地区第三期各组文化因素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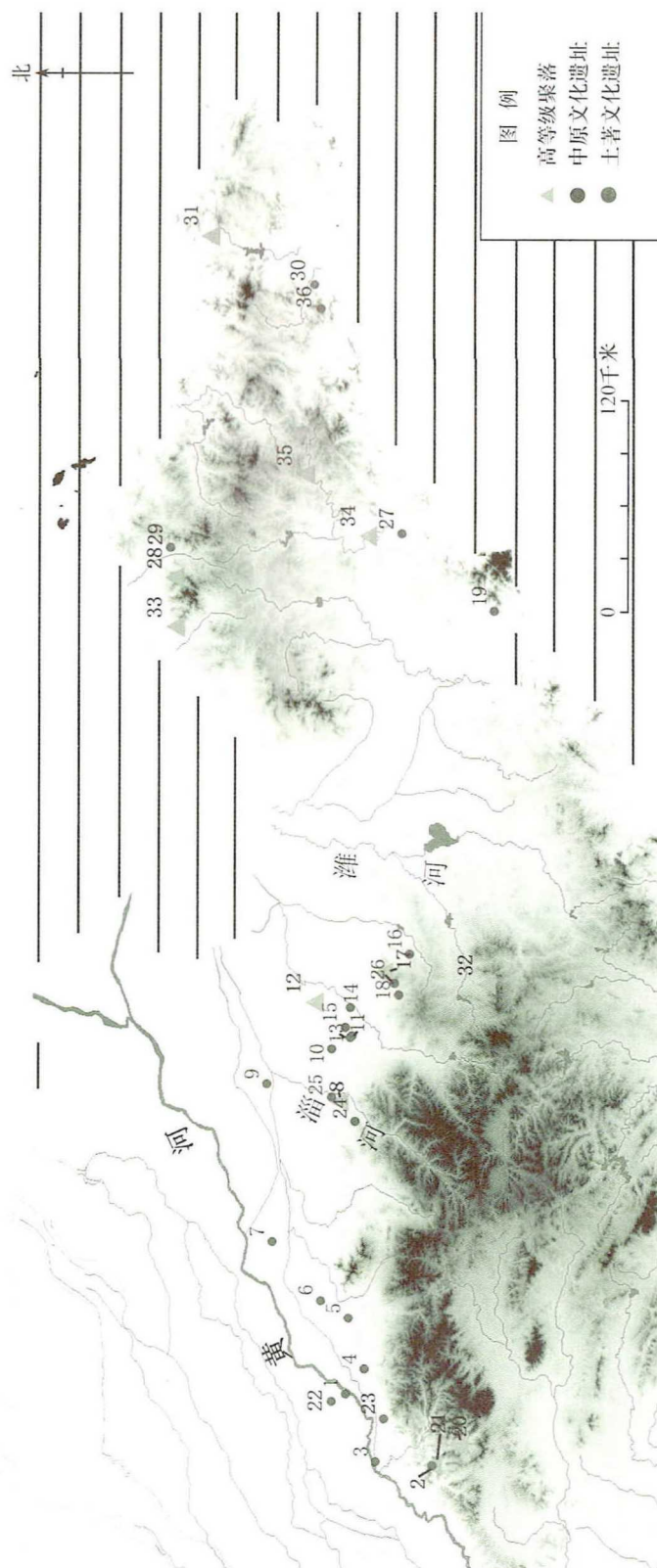
- 1~4. 鬲 (昌乐: 3、王府H172: 2、王府H211: 3、王府H105: 30) 5. 簋 (高青陈庄H442: 1) 6. 豆 (王府H79: 5) 7、8. 孟 (王府H63: 10、王府H130: 26) 9. 罐 (王府H105: 25) 10、11. 豆 (岳家河M132: 9、岳家河M118: 7) 12~14. 罐 (齐故城M11: 5、两醇M3101: 2、刘家庄M40: 1) 15~17. 鬲 (高青陈庄H279: 1、王府H105: 22、王府H79: 4) 18. 甗 (高青陈庄F2: 2) 19、20. 盆 (王府H105: 3、王府H145: 7) 21. 鬲 (两醇M3176: 3) 22、23. 罐 (仙人台M3: 12、周家M1: 7) 24. 甗 (归城M2: 1)
- 25~27. 簋 (昌乐: 10、赵铺: 25、岗宋台: 11) 28. 盆 (齐故城H127: 5) 29. 罐 (齐故城H140: 3) 30. 盆 (王府H105: 21) 31. 罐 (王府H105: 28) 32. 盆 (赵铺T1②: 4) 33. 孟 (王府H38: 6) 34. 甗 (南黄庄采集: 2) 35、36. 盆 (南黄庄H5: 1、岳家河M118: 9) 37、38. 罐 (大辛庄4M1: 3、两醇M3194: 3) 39. 簋 (归城M2: 2) 40. 孟 (两醇M3176: 6) 41. 鬲 (归城M2: 5) 42. 鼎 (南黄庄M6: 3) 43. 鬲 (南黄庄M2: 1) 44. 簋 (南黄庄M15: 4) 45~52. 鬲 (昌乐: 6、王府H105: 24、赵铺: 20、潍坊凤: 1、齐故城H140: 10、王府H143: 5、王府H172: 3、王府H120: 1) 53. 罐 (齐故城H127: 17) 54. 钵 (王府H191: 5) 55~60. 鬲 (仙人台M3: 3、岳家河M132: 5、岳家河M134: 6、两醇M3180: 3、两醇M3101: 1、两醇M3189: 4) 61~63. 罐 (南黄庄M15: 1、南黄庄M2: 3、南黄庄M2: 4)

统治地位已确立起来。但通过对器物型别与其数量占比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发现, 潍河以西考古遗存的自身特征也十分明显。

从陶鬲形制观察, 该地区的主要器形包括鼓肩分裆鬲、鼓腹联裆鬲、鼓腹分裆鬲、平裆柱足鬲、小口宽联裆或分裆鬲、筒腹或深弧腹联裆鬲等。其中, 鼓腹类器形成为此时最流行的特征, 这与丰镐地区常见鼓肩类陶鬲的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并且鼓腹类陶鬲在东周时期延续, 成为齐地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而外斜弧腹宽裆和筒腹等器形特征多是受该地区晚商与本地风格的影响所致, 关中地区则多不见。另外, 周人创新的平裆柱足鬲在西周中晚期的丰镐及洛邑地区十分流行, 而该地区此类器物与鼓腹类或鼓肩类器物相比, 并不占主导地位。陶罐方面, 上一期流行的折肩或鼓肩罐此时呈现颓势。以近圆腹特征为代表的陶罐占这一时期使用数量的主体, 并且与新出现的鼓肩下腹弧收平底罐等器形在该地区东周时期普遍流行。陶簋以居址中常见的宽折沿、腹部弧折者最具代表, 其他器形则比较罕见, 并且宽折沿弧折腹簋随后逐步发展成为春秋时期齐文化墓葬陶器组合的核心器类。此外, 这一时期出现的圜底孟、鼓腹平底孟、折腹平底盆等陶器都不见于中原地区, 并且它们延续至东周时期也成为齐文化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以上分析, 以常见的鼓腹鬲、近圆腹罐、宽折沿弧折腹簋等典型陶器为代表, 构成了此时潍河以西地区考古遗存区别于中原地区文化面貌的基本特征, 并且以上陶器与圜底孟、鼓腹平底孟、折腹平底盆在东周时期继续使用, 且大多数具有自身的发展演变序列。据此, 我们认为西周中期周文化在潍河以西初步确立统治地位之后, 通过对商、土著等多种文化因素的淘汰、吸收与融合, 并且包括自身的创新, 进一步整合优化了该地区的文化结构, 使得脱胎于周文化并具有自身特色的齐文化已经孕育出来。

从聚落角度观察(图六), 长清仙人台是本期新出现的高等级据点, 在该遗址以及附近发现有高等级墓葬^[42]。据铜器铭文“郭”字来看, 可能是一处与郭国密切相关的贵族墓地。此时, 临淄齐都城周边据点已有增多迹象, 暗示出都城对人口及资源的汇聚能力可能有所提高。高青陈庄的性质在该时期已发生转变, 城垣废弃不再修补^[43], 济阳刘台子墓地也已经废弃。而据寿光吕宋台的调查报道来看, 吕宋台此期出土的器物比较少, 并且不远处的乘马疃遗址发现了西周晚期的齐式簋和孟。以上材料似乎表明伴随着齐文化的产生, 齐国势力可能也展开过一轮新的影响。

此时, 潍河以东地区的莱文化体现出较强的本地特色。南黄庄文化仍以乳山南黄庄与寨山等两处遗址作为主要据点, 遗存面貌与上期并无二致。莱阳前河前M2曾出土一批青铜器^[44], 其中出现了“己侯作铸壶”的铭文。结合1975年在附近发现有四座墓葬和车马坑来看, 该地区迟至西周晚期应是纪国的重要据点。烟台上夼曾出土己华父鼎和夙侯鼎^[45], 郭沫若认为夙国即纪国^[46], 且两鼎同出一墓, 故“夙”“己”均为一国之称, 即文献中的纪国。龙口归城和平村也曾出土一件己侯鬲, 年代大致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上青铜器均与纪国有关, 且密集出现在胶东半岛, 或可推测迫于齐国势力的崛起, 纪国不得不东迁于此。



图六 鲁北地区第三期遗址的分布态势

1. 平阴宋家桥 2. 李清仙人台 3. 济南王府 4. 济南唐冶 5. 章丘宁家埠 6. 邹平鲍家 7. 高青陈庄 8. 临淄齐故城 9. 广饶草桥 10. 青州凤凰台 11. 青州越铺
12. 濰坊后王 13. 濰坊崔马庄 14. 寿光芮宋台 15. 寿光贾家庄 16. 昌乐河西 17. 昌乐宁家 18. 昌乐常家庄 19. 青岛古城顶 20. 长清石都庄 21. 长清义灵关
22. 济南大辛庄 23. 济南刘家庄 24. 临淄西仲 25. 临淄东古 26. 昌乐岳家河 27. 即墨北阡 28. 龙口城 29. 东营周家村 30. 乳山南黄庄 31. 威海
32. 安丘鼈山乡 33. 烟台上夼 34. 莱阳前河前 35. 海阳发城镇 36. 乳山寨山

二、西周王朝经略鲁北地区的历史进程

(一) 西周早期

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姬周成为天下共主,但“小邦周”接管商王朝在鲁北地区的政治遗产却是通过一系列征伐战争才得以实现。成王继位之初,薄姑、奄等东夷旧国与殷遗贵族发动叛乱,随即周人二次东征。除传世文献记载之外,璽方鼎(《殷周金文集成》^[47] 2739)、旅鼎(《集成》2728)、保卣(《集成》5415)、师卫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48] 02378)、师卫簋(《铭图》05142、05143)等成王时期的金文材料也都证实了这场动荡。随后,周夷冲突仍然持续不断,小臣盂簋(《集成》4238、4239)、寔鼎(《集成》2731)、甗鼎(《集成》2740、2741)等金文材料记载了康、昭之世征伐夷方的战事。在西周王朝持续的战争涤荡下,晚商以来的青州苏埠屯、桓台史家、济南大辛庄、博兴寨卞等大型遗址消失不见,刘家庄墓地也呈衰退趋势。同时,周文化与其参与的融合型文化因素在长清、济南、章丘、淄川、临朐、寿光等地皆有发现,但长期的混乱局面使得潍河以西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商、周、融合型与土著等文化因素相互杂处的局面。

与征伐并举,周王室将周人及其盟友作为殖民势力派驻至此,通过册封诸侯与布控据点,重构了鲁北地区的统治体系。济阳刘台子应为逢国都邑^[49],其中M2出土陶鬲1、罐1与“季作宝彝”鼎暗示出墓主来自周王室的背景。阳谷梁山的青铜器窖藏与召氏家族有关,或为周人的重要据点^[50]。寿光吕宋台可能为纪国都城,曾采集到联裆柱足鬲等器物^[51]。齐国早期分封地点虽未确定,但结合诸家关于营丘地望的考证^[52],可大致圈定在淄弥河地区。高青陈庄与临淄齐城皆处于齐国势力范围,前者发现的M17应为齐太公后人^[53],后者见有M101、M102与M103等贵族墓,其多出联裆柱足鬲。从封国与据点的分布来看,周人应对商人原重点经营的地方进行了布控,如高青陈庄可能对博兴附近的人群进行监视^[54],临淄齐城应是为了控制淄弥河地区的殷夷势力,阳谷梁山则主要把持鲁北南下的重要通道,而逢、纪二国作为东夷旧国的亲周势力,可能在其原居地得以存续,周人并未作重点介入。同时,传为山东出土的王妇匚^[55]与济阳刘台子M3出土的王季鼎可能暗示出周王室与纪、逢二国有联姻关系。由此可见,此时周人对原商文化分布区的管理是以加强殷夷人群的监视、控制与稳定为主要目的。

胶东半岛的文化发展相对迟缓,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周人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已涉足此地,该地区应仍以土著居民为主。并且从青岛古城顶等遗址来看,夷人势力很可能在偏早阶段趁潍西政局动荡之际有过一次向南扩张的活动。而在偏晚阶段局势却发生了变化,尽管潍河附近的会泉庄遗址还未消失,但周人势力已跨过潍河与胶莱平原,直插至胶东半岛的东北部,在龙口附近建立了城址。从旅鼎、启卣、蔡姑簋等铜

器铭文来看^[56]，该地区的人群构成较为复杂，龙口归城可能作为周人的军事基地而存在^[57]。同时，胶州西菴与海阳发城镇等遗址也说明周人势力已到达胶东半岛南部。周人的这一布局，很可能对东夷势力形成分而击之的南北挤压态势，胶东政局在此时已发生本质变化。

（二）西周中晚期

潍河以西的西周中期考古材料反映出周文化已居主导地位，但此时的考古遗存中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土著与商文化因素，并且以周文化成分为主的混合型文化因素迅速发展。这种多元并包、兼收并蓄的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尚书》中《康诰》《酒诰》与《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齐太公“因其俗，简其礼”等周人处理商夷关系的准则与实践。正是在周人包容开放的政策指引下，西周早期的动荡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文献中已基本不见此时周王朝与东土敌对势力作战的相关记载。与此同时，周人在胶东半岛的统治地位也得以确立。不过，周人对土著居民的改造力度较为有限，很大程度保留了本土习俗，但当地贵族阶层应接受了以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原礼制文化。而作为华夏边缘的夷人群体，其势力已退缩至半岛东南的乳山一隅，文化影响十分有限。从南黄庄墓葬的陶器组合、器物形制与纹饰等特征来看，周文化的影响已渗透至此，夷人群体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其华夏化进程正加快推进。

有研究表明，穆王时期是西周王朝的重要分水岭，此后国家混乱与冲突的信号开始频繁出现^[58]。《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治临淄。”这则文献清晰地反映了周王室、纪国与齐国之间的交恶，作为献公自立的惩罚，夷王五年师事簋（《集成》4216）传递了周王命令军队进攻齐国的历史线索。而从文献记载献公执政九年，并且传位自己宗子的内容来看，周王室对齐国的讨伐似乎并不顺利。但从高青陈庄在西周中期偏晚以后城墙废弃^[59]与M35出土引簋的铭文信息^[60]来看，周王室应该对齐国采取了一定的军事打击。这场争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中央权力逐步衰减的背景下，齐国势力的崛起使周王室在鲁北地区的统治威望遭到重创。西周晚期的考古材料表明，潍河以西的周文化已经发生变化，在不断吸收与融合商及土著文化因素的条件下，区域特征鲜明的齐文化开始形成，同时岳宋台遗址逐步凋零，而胶东半岛出现大量纪国铜器，这些社会图景似乎都为春秋时期齐国称霸奠定了基础。

三、结 语

通过上文分析,鲁北地区西周时期的文化演进与政治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西周早期,受晚商文化经营与周人东征和分封的影响,潍河以西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商、周、土著文化之间相互碰撞融合,催生出大量创新型器物,并且居址与墓葬之间的文化内涵缺乏稳定性。晚商聚落在衰落的同时,代表周人势力的核心聚落也在商人重点经营的区域展开,齐、逢、纪等国成为周人经略鲁北的重要力量。在潍西政局动荡之时,珍珠门文化开始向胶东半岛南部渗透。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周文化在空间上已形成对珍珠门文化的合围与挤压之势。西周中期,潍河以西的周文化与周文化参与的融合型文化因素成为主体成分,居址与墓葬的文化结构趋向稳定。原分布在胶莱平原与胶东半岛的夷人势力迅速衰落,盘踞在东南一隅的南黄庄文化也在此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周人势力此时以胶东半岛北部为主,但在物质面貌上仍有十分鲜明的地方特点。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脱胎于周文化但具有自身特色的齐文化已孕育出来。伴随着齐文化的产生,逢、纪二国原有核心区的衰落与纪国势力东进胶东半岛可能正是齐国势力对周边地区展开影响所致。

鲁北地区自晚商以来的政治格局与西周王朝的经略手段是影响该地区西周时期文化演进与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因。西周王朝的殖民与羁縻是经略该地区的主要手段。西周早期,面对数量庞大的殷夷旧部,周人主要通过武力戡乱取得了鲁北地区的控制,周文化核心聚落点状插花般地从泰山东部渗透至胶东半岛最东端,形成了对殷夷势力的制衡。频繁的武力冲突,使得鲁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因素并存、结构不稳定与文化对立等特点。西周中期,在取得统治地位的稳定之后,周人在鲁北地区主要采取了羁縻的政治策略。联姻或安抚等手段笼络东夷旧国的现象在铭文中时有见到。而在文化面貌上,商文化与土著文化因素虽然逐步衰落,但不断与周文化因素相融合,从而创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正是这种包容开放的文化策略才使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周文化迅速取得了鲁北地区的统治地位。西周晚期,鲁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政治势力与关中地区产生了疏离,鲁北地区的封国势力出现了较明显的重组,齐文化也应运而生。因此,作为地方势力崛起的条件,周王朝对鲁北地区包容、羁縻的策略又不得不说是为此创造了可能。

注 释

- [1] 主要范围包括河北省以东,渤海、黄海以南,泰山、鲁山以北的鲁北平原与胶东半岛等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德州市、聊城市、济南市、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潍坊市、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等地区。
- [2] a. 邵望平. 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 [J]. 燕京学报, 2001 (2).
b. 曹斌. 周文化统治的历史格局在“东土”的形成 [J]. 考古, 2017 (6).
- [3] 李首龙. 鲁北地区晚商西周时期考古学遗存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 [4] 张铤. 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D]. 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0 (6).
- [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淄齐故城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 [6] 潍坊市博物馆. 昌乐县文物管理所. 昌乐县后于刘遗址发掘报告 [C]. 海岱考古 (第五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7] 山东大学考古系. 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 [J]. 考古, 1998 (9).
- [8] a.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 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 [J]. 考古, 1992 (11).
b.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 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 [J]. 考古, 1994 (2).
- [9] 任相宏等. 淄川考古——北沈马遗址发掘报告暨淄川考古研究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 [10] a.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 [J]. 文物, 1972 (8).
b.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州市博物馆. 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 [C]. 海岱考古 (第一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9.
c. 夏名采等. 山东青州市苏埠屯墓群出土的青铜器 [J]. 考古, 1996 (5).
- [11] 张光明等. 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 [N]. 中国文物报, 1996-5-18 (20).
- [12] 方辉等. 大辛庄遗址研究·资料卷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 [13] 燕生东. 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40-41.
- [14]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 [C]. 海岱考古 (第十一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15] 燕生东. 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72-73.
- [16] a.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 [J]. 考古, 2010 (8).
b.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1 (2).
- [17]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金文集成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 [18] 寿光县县博物馆. 寿光县古遗址调查报告 [C]. 海岱考古 (第一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9年.
- [19] a. 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 济阳县图书馆.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1981 (9).
b. 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 济阳县图书馆.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 [J]. 文物, 1985 (12).

- [20] a. 王恩田. 纪、己、莱为一国说 [J]. 齐鲁学刊, 1989 (1).
b. 朱继平. 周代东土纪国地望订补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5).
- [21] 李学勤. 有逢伯陵与齐国 [C]. 齐文化纵论.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3.
- [22] 朱继平. 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 [J]. 考古, 2012 (1).
- [23]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李沧区古城顶遗址2010年度发掘简报 [C]. 青岛考古 (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 [24] 鲁东南沿海地区中美联合考古队. 山东黄岛王家庄遗址调查及相关问题分析 [J]. 东南文化, 2017 (5).
- [25] 齐文涛. 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J]. 文物, 1972 (5).
- [26] 张真等. 山东海阳市上尚都出土西周青铜器 [J]. 考古, 2001 (9).
- [27] 李步青, 林仙庭等. 山东省龙口市出土西周铜鼎 [J]. 文物, 1991 (5).
- [28] 马志敏. 山东省龙口市出土西周铜簋 [J]. 文物, 2004 (8).
- [29] 曾毅公. 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 (下) [M].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印本, 1940.
- [30] 李步青, 林仙庭. 山东黄县归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J]. 考古, 1991 (10).
- [31]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 胶县西菴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J]. 文物, 1977 (4).
- [32] 李峰, 梁中合. 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452-461.
- [33] 李峰, 梁中合. 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16.
- [34]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 烟台芝水遗址发掘报告 [C]. 胶东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35] 海阳市博物馆. 山东海阳市上尚都出土西周青铜器 [J]. 考古, 2001 (9).
- [36]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 胶县西菴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J]. 文物, 1977 (4).
- [37] a.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 [J]. 文物, 1996 (12).
b. 高西省, 秦怀戈. 刘台子六号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 [J]. 文博, 1998 (6).
- [3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淄齐故城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532-535.
- [39]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乳山南黄庄石椁墓 [C]. 胶东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40] a. 王锡平. 胶东半岛夏商周时期的夷人文化 [J]. 北方文物, 1987 (2).
b. 张锬. 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D]. 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41] 王青. 海岱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60-162.
- [42] a. 山东大学考古系. 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 [J]. 考古, 1998 (9).
b. 吴荣桂. 山东长清县北黄崖发现的周代遗物 [J]. 考古, 2004 (4).
- [43] 曹斌. 山东高青县陈庄遗址性质探析 [J]. 考古, 2018 (3).
- [44] 李步青. 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 [J]. 文物, 1983 (12).
- [45] 齐文涛. 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J]. 文物, 1972 (5).

- [46]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7. 下文简称《集成》。
- [48] 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下文简称《铭图》。
- [49] 李学勤. 有逢伯陵与齐国 [C]. 齐文化纵论.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3.
- [50]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金文集成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 [51] a. 王恩田. 纪、莱为一国说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5).
b. 寿光县博物馆. 寿光县古遗址调查报告 [C]. 海岱考古 (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 [52] a. 张学海. 齐营丘、薄姑、临淄三都考 [C]. 张学海考古论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b. 夏名采. 营丘初探 [J]. 东岳论丛, 1986 (2).
c. 李学训. 营丘地望推考 [J]. 管子学刊, 1989 (1).
- [53] 曹斌. 山东高青县陈庄遗址性质探析 [J]. 考古, 2018 (3).
- [54] 关于薄姑地望, 文献记载多与博兴有关, 考古发现的贤城或寨卜遗址可能与此相关。参见: 张学海. 齐营丘、薄姑、临淄三都考 [C]. 张学海考古论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55] 王献唐. 黄县鬲器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0.
- [56] a. 曾毅公. 山东金文集成·先秦编下 [M].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印本, 1940.
b. 齐文涛. 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J]. 文物, 1972 (5).
- [57] 李峰, 梁中合. 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下)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58] 李峰. 西周的灭亡 (增订本)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59] 曹斌. 山东高青县陈庄遗址性质探析 [J]. 考古, 2018 (3).
- [60] 关于引簋年代李学勤认为应在夷王时期, 另《引簋》涉及的“齐师”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是齐国的军队, 另一种认为是周王朝的军队, 我们倾向于后者。参见:
a. 李学勤. 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 [J]. 文史哲, 2011 (3).
b. 曹斌. 山东高青县陈庄遗址性质探析 [J]. 考古, 2018 (3).
c. 方辉. 高青陈庄铜器铭文与城址性质考 [J]. 管子学刊, 2010 (3).